

■历史·民族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伪满洲中央银行与 汪伪中央储备银行货币发行比较研究

郭思齐

(长春财经学院,吉林长春 130122)

摘要:伪满洲中央银行和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是两个有代表性的伪政权银行,它们的货币发行分别表现出两种极端性的倾向。两伪行货币发行中差异性的产生,源于日本侵略者在各占领区所实行的不同经济策略及“金融统制”的不同效果,也与两者各自所处的金融环境有重要关系。从货币银行学的角度看,伪满洲中央银行在金融管理运作上做得相对较为平稳和缓,而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不仅因过量的货币发行而引发了战时国内最严重的通货膨胀,也种下了中国历史上最具危害性金融危机的祸根。

关键词:伪满洲中央银行;汪伪中央储备银行;货币发行

中图分类号:F8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0X(2017)12-0081-06

PDF 获取: <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17.12.018

The Pseudo Central Bank of Manchuria and the Wang's Pseudo Central Reserve Bank currency distribution Comparative Study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GUO SI-qi

(Changchun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angchun 130122, China)

Abstract: The Pseudo Central Bank of Manchuria and the Wang's Pseudo Central Reserve Bank are two representative pseudo regime banks, and their currency issues show two extreme tendencies 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ce of two pseudo-banks currency distribution in the production, due to the different effect in different Japanese occupied areas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ontrols of the Japanese invaders, has important relationship with both the financial environment. From the Money and Banking perspective, the Pseudo Central Bank of Manchuria has done in the pseudo financial operation is relatively smooth and gentle. The Wang's Pseudo Central Reserve Bank not only caused the worst inflation in the country not only because of excessive currency distribution, but also planted the seeds out the hazardou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Key words: The Pseudo Central Bank of Manchuria; The Wang's Pseudo Central Reserve Bank; currency distribution

伪政权银行是现代中国地方银行史上的“另类”,它们是靠日本侵略者刺刀强力维持的区域性银行,存在时间短,生存状态畸形,是中国现代金融史研究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对象。货币发行问题,是伪

政权银行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往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虽曾有所涉及,但尚显不够深入透彻。笔者选择伪满洲中央银行和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的货币发行问题展开比较研究,希望通过对这两家有代表性

的伪政权银行货币发行的共性与特性的分析,揭示它们货币政策的特点及历史影响,深化对其殖民性、掠夺性和反动性的认识。从经济和金融的角度,推进对日本侵华史和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

一、货币发行过程比较

伪银行货币发行过程都带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建行初期少量发行阶段、扩张发行阶段、急剧膨胀发行阶段、垮台之际的最后疯狂膨胀发行阶段。作为伪银行货币膨胀发行的不同机构,伪满中央银行与汪伪中央储备银行货币发行的具体过程,各阶段的时间划分、货币发行数量与增发速度都有较大的差异。

伪满洲中央银行是建立最早,存在时间最长的伪政权银行,从1932年7月开业到1945年11月下旬国民党政府接管该伪银行,共存在近13年半。在建行初期,实行通货紧缩方针对货币发行额度进行了有意识的控制。从1932年7月到1936年12月,货币发行额增长较慢,由最初的1.42亿元增加到2.74亿元^{[1] 501}。1937年起,日本在伪满洲国实施“第一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伪满币发行额也随即开始大幅度增加。到1941年底,发行额增至13.17亿元^{[1] 505}。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以各伪政权银行为金融侵略工具,更加疯狂地掠夺中国沦陷区的财富和物资,导致无节制地滥发纸币,伪满币也于1942年进入急剧膨胀发行阶段。到1945年7月,发行额达到80.85亿元^{[1] 505}。在日本投降前后,从1945年8月到11月,伪满洲中央银行向关东军、伪满政府、垄断企业、日方银行及本行人员大量发放现款,使货币发行总额最终达到136亿元^{[1] 505},约为建行之初发行额的96倍。

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是建立最晚的伪银行,从1941年1月开业到1945年9月停业,其存在时间只有短短的4年零8个月。伪中储券刚刚发行的时候,在各界抵制之下,流通非常困难。汪伪政权采取了鼓励各商业银行和钱庄领取、支付利息、领用暗记券、大力发行辅币等措施^{[2] 62},才扩大了伪中储券的发行。货币发行额由1941年1月0.19亿元^[3]增加到年底的2.37亿元^{[4] 188},其中12月份就发行0.81多亿元^[3]。在1942年,货币发行的增长速度高于前一年度,全年增发伪中储券32.4亿元^{[4] 188}。1943

年1月至1945年8月,是伪中储券极度膨胀发行阶段。在1943和1944年,分别以年增450.76%和629.50%的速度增长,到1944年底总发行额增至1396.99亿元^{[4] 188}。1945年前8个月,增发23520亿元,总发行额达到24917亿元^[5],并且不得不推出10000元券超大面值纸币^[6]。日本投降后,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的货币发行活动进入了更加失去控制的状态。1945年9月,原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和国民党政府接收方不负责任地大肆发放遣散费和用于收编伪军、政府回迁、恢复生产、抢购黄金等的经费,竟突击增发伪中储券21701亿元,其总发行额最后达到46618亿元^[5],为建行之初的245358倍!

伪满券与伪中储券货币发行上的差异,一是发行数量上相差甚大。如果按伪中储券与伪满券100:18^{[4] 244,261}的比价来计算,前者的总发行额相当于后者的61.77倍。二是伪满洲中央银行存在时间长,货币增发过程缓慢;伪中储行则是从建行伊始,就一直处于竭力增加纸币发行的状态之中。在所有的年份和各个发展阶段,伪中储券都远远超过了伪满券的发行额度和速度。伪中储券发行速度最低的年份是1943年,年增长率450.76%;而伪满券发行速度最高的年份是1945年,比前一年份增长131.45%。在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的一份整理伪钞报告中就曾作出过客观的评价:“伪钞的发行以中储券最滥,联银券次之,东北和台湾的情形较好”^{[7] 930}。

二、货币增发动因比较

伪银行货币发行膨胀是诸多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有的是伪银行共同具有的,但在两种伪币发行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和程度不同;也有的是某个伪银行单独具有的,这就导致它将陷于更严重的发行膨胀之中。

(一)向日军提供战争经费

1945年2月,伪满洲中央银行调查部长庆田在日本关东军经理部的秘密会议上就谈到了引起伪满币膨胀发行的主要原因:“通货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不能不说是军费开支,而军费开支又与产业资金相联系,特别是矿工业资金需要的增加”^{[1] 11-12}。伪满洲国军警费用和日本关东军军费占伪满洲国年度财政支出的三、四成^{[1] 12}。起初关东军军费由日满双方按比例分担。到1944年因日本国内财政困难,

遂把关东军军费以“现地筹办”的方式完全转嫁给伪满洲国政府。具体方式是,由伪满洲中央银行以借款的方式向正金银行拨款,然后经日本政府、军部再转拨到伪满洲中央银行的关东军帐户上。1944年度关东军军费为13亿元,1945年7月增加到23亿元^{[1] 373—374}。

汪伪中储银行同样也要为日军承担巨大的军费开支。朱佩禧指出,1944年前9个月“中储券增加的发行额中90%以上都被正金银行获得,……而且其中的98%累计发行数量是用于军费开支”^{[2]127}。洪葭管则指出,中储银行增发货币的86%以上供给了以陆海军为主的日方单位^{[8]373}。另据浅田乔二统计,1943—1945年间,华中、华南地区向日本提供的战费高达25034亿元^{[4]265}。

(二)为日本在华进行产业或物资掠夺放款

日本占领东三省后,就将这一地区作为侵华战争后方基地进行了精心的经营。日本在东北设立了几十个“特殊会社”及“准特殊会社”,伪满洲中央银行向这些日本垄断企业提供了大量的贷款。到1945年6月末止,伪满洲中央银行借给正金银行、兴业银行和兴农金库等三家“特殊银行”的贷款高达76.54亿元,占放款总额的75.5%。其中兴业银行所获得的35.15亿元贷款是重点支持军工生产的,兴农金库所获得的18.39亿元贷款主要是用于抢购粮豆及其他农副产品^{[1] 18—20}。这种资金上的大力扶助,保障了日本在东北“产业开发”和大肆开展经济掠夺的需要。

日本在华中地区的经济政策主要是掠夺为满足侵略战争直接需要的各种战略物资。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在为其主子抢购物资的活动中充当了重要角色。1943年,伪中储银行为日伪收买棉纱棉布先后垫付了100多亿元的价款^{[9]39}。伪中储银行又通过给予商业银行转抵押、重贴现等方式,向上海各种贷款银团提供巨额贷款。1943年提供了53亿元贷款,1944年6月增加到102亿元。1945年上半年,对伪“全国商业统制总会”下属的4个专业委员会提供了1367亿元的资金支持^{[8]374}。伪中储银行就这样为日寇在华中大规模的物资掠夺解决了资金上的贪婪需求。

从伪银行向日军支付军费的绝对额来看,1944—1945年伪中储银行提供给日本侵略者的资

金大约相当于伪满洲中央银行提供资金的9.7倍。在经济放款方面,伪中储银行提供给日本侵略者的资金大约相当于伪满洲中央银行的四倍以上。

(三)货币多元化和货币战

在东北地区,日本的控制力较强,实行金融统制也较为有力。伪满洲中央银行建立后,对东北旧币进行了强行收缴和清理。至1935年8月收兑完毕“四行号”旧币,伪满政权声称“四行号”旧币折合伪满币共计1.42亿元,已收回1.38亿余元,占原有旧币的97.2%^{[1] 145}。1936年底朝鲜银行和正金银行的货币也在东北停止了流通,伪满洲国实现了币制统一,伪满券的发行流通基本不受其他货币的影响。

华中地区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在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短短4年半的历史上,多种货币共同流通于同一地域、互占流通的情况就有2年时间。1941年末,日本军票发行额为2.44亿元^{[4]188},相当于伪中储券当时发行额的近六倍。1943年4月停止发行并以100:18的比价回收军票。法币的情况更复杂。20世纪40年代初,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流通的法币有40亿元^{[10]79}。伪中储券在初期发行、流通困难,就是因为华中地区的商民宁愿接受法币而不愿意接受伪中储券。汪伪政府对待法币的态度开始是允许法币与伪中储券同时使用,以等价的伪中储券大量收兑法币,以便转手从英美换取外汇。1942年3月,改为以100:77的兑换差价排挤法币。1942年5月下旬,又以100:50比价强行收兑法币,禁止其继续流通。于是法币即被驱逐出华中各大城市,但仍在广大农村地区继续流通。日伪在与法币开展“货币战”的过程中,将通货膨胀政策作为驱逐法币的武器,同时也成了推动伪中储券疯狂发行的动力。从1941年8月至1942年4月,伪中储券一般以每月增发2000万元至1亿多元的高速度巨量发行^{[10] 78}。至1942年底,伪中储券的发行额就达到了34.77亿元^{[4]188}。

(四)金融投机

近代以来,上海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欧战爆发后,香港、新加坡的游资流入上海。至1941年底,上海外来及本地游资在100亿元左右。1942年以五折强制兑换法币后,游资减至50亿元^{[2]143}。在物资统制、工商业生意难做、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囤积居奇、货物押款,成为银钱业运用资金追逐

利润的最重要的途径。到日本投降时,上海有银行195家,钱庄226家,为有史以来金融机构数量最多的时期。这些银行、钱庄除自身进行投机和囤积外,还为一些公司、贸易行号等企业提供投机资本,造成社会上生产资本的萎缩和投机资本的空前膨胀^{[8]366}。金融投机活动加剧了物资供应紧张状态,刺激着物价以更快的速度上涨,同时也造成日本用于筹措军费和搜刮物资的资金需求急遽增加,因此就必须更大幅度地增发货币,这形成了无止境恶性循环的怪圈。金融投机则对物价上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滥发货币导致的通货膨胀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物价上涨远远高于货币增发的速度,汹涌奔腾的物价就无法控制了。1944年以后,汪伪政权曾经采取过抛售黄金和发售金证券的方法,企图对严重的通货膨胀有所抑制,但所能投入市场上的黄金毕竟有限,对于暴涨的物价只能是杯水车薪,作用甚微。

伪中储券通货膨胀的程度远比伪满币要高,原因在于影响货币超量发行的因素,华中地区比东北地区复杂严重得多。到日本投降前夕,伪中储券以天文数字膨胀发行,已经进入了超高速运转的状态,而伪满币则尚未达到这样的程度。

三、滥发货币后果比较

日寇根据“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基本方针,建立了以伪政权中央银行为核心的殖民地性金融体系。他们通过操纵伪银行超量发行伪币,控制沦陷区经济命脉,利用经济手段隐性地搜刮中国资财,无异于变相抢夺行为,对中国人民欠下了累累罪行。伪币发行的恶果体现在诸多方面,限于篇幅,本文仅谈以下五点。

(一)在金融上支持日本侵华战争

伪满中央银行与伪中央储备银行大量发行伪币造成的恶果,首先是为日寇提供了继续进行战争的财力。日本资源匮乏,国内支援战争能力有限,因此其维持战争的主要手段是“以战养战”,利用占领区的财力和资源维持侵略战争。伪政权金融管制重心是日军通过伪币控制资金分配。如前文所述,在1943年以前,驻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军费由日满双方分担,到1944年改由伪满洲国政府完全承担,实际上就是通过增加发行伪满币的方法解决关东军

的军费问题,以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来维持日本对东北地区的占领。在华中地区,伪中央储备银行是日寇筹措军费和聚敛军用物资的帮凶,而且日军军费在伪中储券发行额中所占比重,要大于其在伪满币发行额中所占的比重。不仅如此,伪中央储备银行还通过使用伪中储券强制兑换法币,再以法币套购外汇,采购战争物资,甚至向欧美国家购买汽车、钢铁、石油、重金属原料及军工设备,囤积战争资源,充实军事力量,为日寇延续罪恶战争做垂死挣扎。可以说,没有超量发行伪币所提供的巨大财力,日寇是无法将侵华战争长期进行下去的。

(二)掠夺资源造成中国经济上的巨大损失

通过超量发行伪币,使日寇用伪银行的钱低价“买”走了中国的大量物资,这不仅使日寇大大获益,而且也使中国在经济上遭受到严重摧残。日本在东北地区资源掠夺的重点是矿产和农产品。日寇通过操纵伪满洲中央银行超量发行伪满币并向日本企业提供大量的资金,使之低价购得东北的各类资源。1931~1944年,日本从东北掠夺煤炭22800万吨,掠夺生铁1200万吨^{[11]422};1935~1944年,掠夺钢材1308万吨;1937—1944年,掠夺农产品5750万吨^{[12]802};1943年,从辽西杨家杖子掠夺精钼矿900吨^{[12]297};1931~1945年,日本企业通过“拔大毛”的野蛮采伐方式,掠夺东北木材达上亿立方米,同时使森林以及环境遭到严重毁坏^{[13]173}。华中沦陷区相对面积狭小,局限于长江沿岸和东南沿海地区,日寇主要通过低价强行征收华中地区农产品和盐、蚕丝等轻工业原料,以维持华中日军军需和满足国内企业的原材料需求。1943年,日伪以只及市价四分之一的低价在上海强行征收棉纱70多万件,使上海纱厂损失达69亿元^[14]。日寇在华中掠夺资源的需求是决定伪中储券发行量的重要依据。由于中储券超发贬值,造成大量民族蚕丝厂亏损关门倒闭。到战后的1946年,浙江原有的33家丝厂大部分倒闭,丝车剩余4474台,年产丝由十年前的2.4万担下降到了6500担^[15]。在华中的农村则出现了土地荒芜、耕地减少、农业生产严重下降的状况。据统计,华中一带15种主要农作物的总收获量,战时平均比战前的1936年降低了20~30^{[16]37}。

(三)开展货币战给中国政府制造困难

关内各伪银行在对中国政府开展货币战的过程

中,充当了日寇的得力工具,其中又以伪中央储备银行最卖力气。日伪通过伪中储券进行货币战的方法包括:以伪中储券兑换法币,尔后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套购外汇,换取急需的战略物资;采取不平等兑换的手段使法币人为贬值,近而在沦陷区禁止法币流通,将法币排挤出华中沦陷区;在与抗战区接近的地区使用伪中储券购买物资,或利用汉奸、奸商使用法币到抗战区抢购物资,甚至设法让伪中储券流入抗战区,以抬高抗战区物价,加剧抗战区的金融危机,企图以此摧毁中国政府的抗战财政经济基础。1942年3月至9月,日伪即以伪中储券4.56亿元在华中沦陷区吸收法币11.28亿元^{[4]236},其中很大部分法币被便运到邻近抗战区的地区抢购物资^{[4]238}。1943年,日寇将5000万元法币运到广州高价收购各种物资^[14],又集中搜集到的3000万元法币到浙江西部高价诱购大米^[17]。日伪针对法币所开展的货币战,当时的确给民国政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1941年12月至1945年6月,大后方的法币膨胀发行了26倍,批发物价上涨了95倍^{[18]38}。日伪开展货币战是以扰乱抗战区金融秩序为主要目的,它既是导致大后方严重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也是日寇掠夺中国资源的一种特殊手段。

(四) 引发物价上涨给沦陷区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大量增发货币自然要造成物价上涨,进而使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各伪政权统治地区人民都曾饱受滥发纸币之苦,但物价上涨对人民生活所带来的影响程度,在东北和华中两地区却有着很大的差别(详见表1)。

表1 1937—1945年满洲与上海物价指数比较表

年份	1936年=1	
	满洲	上海
1936年	1.00	1.00
1937年	1.18	1.19
1938年	1.41	1.43
1939年	1.71	2.32
1940年	2.13	5.06
1941年	2.53	10.99
1942年	2.82	34.53
1943年	2.81	143.62
1944年	3.37	2843.02
1945年	4.14	97402.48

资料来源:满洲批发物价指数见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58

页。上海批发物价指数见中国社科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4页。

注:本表系在贺水金《由乱至治——1927—1952年中国金融与财政问题研究》一文表10—13“1937—1945年中国各地批发物价指数比较”基础上改制的。满洲原指数以1933年=1,为便于价比较,已换算为以1936为基年。1945年数据,满洲为1—3月指数,上海为8月指数。

“新京”(长春)物价上涨速度在全国各大城市排在末位,1936年到1945年间批发物价指数(公道价格)仅上涨至4.14。上海批发物价指数在全国最高,1945年8月上涨至1936年的97402倍,物价上涨速度为“新京”的23527倍!两地物价涨势差额的明显扩大,恰是在1941年以后。上海的物价在伪中储券恶性膨胀的推动下不断狂涨。到1945年前六个月,上海批发物价指数每月狂涨3127至32300^{[19]159—160},当时上海物资极度匮乏,粮食价格飞涨,人民经济收入财产极度缩水,连素称捧“金饭碗”的银行职员也不得不靠喝粥充饥^{[20]720},普通民众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

(五) 制造金融混乱为日后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埋下祸根

两个伪银行虽然都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但通货膨胀的程度相差较大。在伪满洲中央银行通货膨胀率有3年在一位数(2.6%—9.9%),1年呈负数,其余8年都是二位数(11.5%—24.5%),该行大体上处于由温和通货膨胀转向急剧通货膨胀发展的阶段。伪中储银行通货膨胀率有两年在三位数(208%—257%),两年在四位数(1325%—3342%),主要处在超速通货膨胀的阶段。如果不是日本战败投降,伪中储券大量发行引起的超速通货膨胀将使汪伪政权陷于金融崩溃的绝境。至于伪满洲中央银行的通货膨胀并不十分严重,在其他客观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似乎仍可维持一段时间。

伪中储券的巨额发行推动物价不断狂涨,使得华中尤其是上海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恶性膨胀阶段。伪中储券滥发引起的金融危机虽然因日本投降而被打断,但其在历史上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却不容忽视。正如抗战胜利不久一位署名“一萍”的评论家所说:“伪币的滥发所带给我们的物价飞腾的遗害,恐怕是一时难以清除的”^{[21]427}。遗害的表现之一,就是伪中储券滥发曾带来金融秩序极度混乱的局面,给日

后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埋下了祸根。长时间的通货膨胀,增发货币——物价飞涨——增发更多的货币这种怪圈的恶性循环,使人们对于战时管制下的货币信用度已失去信心。在光复后,上海民众仍然普遍重物轻钱,心理上继续保持着物价将继续上涨的预期;商人们则偏好投机,囤积居奇,这就使钱多物少的局面一时难以改变。伪中央储备银行的金融运作与货币发行机制在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承袭下来。在1945年9月短暂的物价下跌之后,“上海物价于10月后即迅速回升……到了12月份,上海的批发物价指数已上升到了88544,较诸8月份增加了一倍”^{[18]48}。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以人们意想不到的威势卷土重来,阻碍了战后经济复苏,进一步引发了后来上海乃至整个国统区经济的全面崩溃。

四、结语

伪满洲中央银行与汪伪中央储备银行都是日寇为实现对中国进行军事、政治与经济侵略目的而建立起来的,是完全服务于日寇意志的殖民地金融机构。它们的货币发行数量不是由占领区经济发展需要所决定,而是由日寇侵略与掠夺的需要所决定的。由于各占领区资源特点及对其控制程度的不同,日寇利用伪币进行经济掠夺的做法也各不相同,分别采取了间接的产业投资式与直接的物资抢购式的掠夺方式。日寇把通货膨胀作为金融侵略工具,根据占领区金融环境的不同,选择了温和的或极端的通货膨胀形式。从客观上看,伪满洲中央银行的通货膨胀率较低,金融运作的效率相对较高;而通货膨胀率过高的汪伪中央储备银行,虽然在短期内榨取了可观的资财并满足了日寇的货币需求,但由此产生的金融风险和社会震荡却说明,其金融运作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日寇与汪伪政权强化统治秩序的初衷。由此可见,伪满洲中央银行在帮助日本侵略者掠夺资财方面的作用实际上更大一些,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所造成的军事上与金融上的危害性则更为严重。

[参考文献]

[1] 吉林省金融研究所. 伪满洲国中央银行史料[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

- [2] 朱佩禧. 寄生与共生: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研究[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
- [3] 发行局1941年度总报告书,1942-2-9[G].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2041-1-51.
- [4] 浅田乔二,等. 1937—1945日本在中国国家的经济掠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 [5] 戴建兵. 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及伪中储券[J]. 中国钱币,1995(3).
- [6] 沈飞. 中央储备银行及其发行的货币[J]. 收藏,2011(2).
- [7] 洪葭管. 中央银行史料[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 [8] 洪葭管. 中国金融通史(四)[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
- [9] 周永红. 伪中央储备银行研究[D].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
- [10] 上海档案馆.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档案史料汇编(下)[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 [11] 于素云,等. 中国近代经济史[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
- [12]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M]. 北京:中华书局,1991.
- [13] 琼斯. 1931年以后的中国[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 [14] 齐春风. 抗战时期大后方与沦陷区间的法币流动[J]. 近代史研究,2003(5).
- [15] 黄宗南. 日军暴行和对周边地区蚕丝业的摧残[J]. 桑蚕通报,2015(1).
- [16] 郑伯彬. 日本侵占区之经济[M]. 鸿福印书馆,1945.
- [17] 中统特种经济调查处. 敌伪经济汇报[R]. 1942(42), 1943(46).
- [18] 张公权. 中国通货膨胀史(一九三七——一九四九年)[M].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
- [19] 吴冈. 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 [20]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 中国银行行史(1921—1949)[M]. 北京:金融出版社,1995.
- [21] 北京金融史料银行篇(十)[M]. 北京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1995.

[责任编辑 雷润玲]